

台湾文学论稿

计璧瑞 著

华文出版社

序

曹文轩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原因，“台湾”作为一个省份的名称，在大陆媒体中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的名称的出现频率都要高出许多。台湾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台湾是漂在大洋上的一叶难以靠岸的扁舟，是一张抓在许多人手里的牌，是一篇谁都要做的文章，因此“台湾”就成了一个高频词。

然而，我们究竟知道台湾多少？

由于它是一个焦点，由于它的突兀与抢眼，我们反而不能对它进行细读。对它，我们只满足于一种笼统的甚至是粗糙的感觉。台湾在我们不时地听到它的名字以至于感到烦躁的状态下，在我们的意识中反而是没有细部和深度的。台湾就只剩下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片宜人的自然风光，一个让中国人也让世人感到烫手的热芋头。台湾在大陆人眼中，是一份历史、一份亲情、一份祖业、一份主权。

殊不知，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等方面的原因，它在许多方面都已逸出了我们的想象。从荷兰“红毛”入侵到日本人的长期占据，再到与大陆跑在完全两样的政轨之上，事实上，台湾早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

殊的读本。

它的文学就是例证。

计璧瑞对台湾文学进行研究已经有许多个年头了。她的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台湾现代文学，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着自己的别具一格的形态，并不总是能被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所框就的。它像一个走失了的或是被人掳走的孩子，离开了它的众多兄弟，在另样的空间中呼吸、成长、挣扎，已渐渐地有了它自己的经验、思路和言说方式。它有时与它的兄弟们在一个水平线上朝着一个方向行进，而在许多时候却是远离它的兄弟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无奈，反正走岔了，走开了，走到了另外的天地里。它有它的风景。

中国大陆出了许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因为觉得难以将台湾文学置入同一框架而将其搁置在一旁的，也有觉得将其搁置一旁不合适而硬行纳入的。后者在纳入时，大概都感到了一种困惑：若将它放置在同一框架中叙述，它有太多的例外，必然会穿出框架横出一块。尴尬还不在横出一块，而在对这横出一块的叙述不知如何进行。叙述者在对它进行描述时，潜意识里总想将它纳入那个大框架，而不能干脆承认它是一个例外、要用另样的方式对它进行处理、要对它单独说事，依着表述大陆文学的思路，使它的特殊性总不能得到很好的揭示，那横出的一块没有被揉开，显得僵硬，像一团死面。

其实，这一块经常处于异境的文学，是活生生的，很有说头的，关键是要摆脱既有的思路，用另样的、可靠的方式说。

计璧瑞的叙述是朴素而科学的：摒弃一切成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先不说是非，先不说得失，先不说长短，先穿越体制与知识体系植就的观念的林莽，来到最初耕作和下种的地方，察看那些庄稼在往日时光里生长与收获的真实情况。她从一个个当初的刊物研究起，从一个个的作家或一篇篇作品研究起。既考察当时的大背景，更对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进行耐心的审读。将主要力量放在描述上，但又不停止于描述，也有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于细致的考查，一个个简洁的结论，是很小心地给出的。我有一种直觉，她所呈现的台湾文学，与从前我在其他大陆人写的著作与文章中所看到的台湾文学似乎不太一样。她笔下的台湾文学是具体的、实在的，有清晰纹理的，是可以触摸的。我相信这是真正的台湾文学。

她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的。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她的研究触角正在向台湾文学的深处刺探。她在全心全意地逼近现代台湾文学的底线。她的企图是明显的：准确地、深入地、完整地呈现台湾文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的自然风景是独特的，台湾的文学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她在用她的文字暗示我们，我们从前对台湾文学实际上是很陌生的，甚至是很隔膜的，台湾文学有许多只有台湾文学所有的景观，也有许多大陆文学所无法替代的价值，而这一切我们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

计璧瑞的文章做得较为沉稳。她对流行的观念与五花八门的新方法，似乎保持着一种距离。她面对着她的研究对象，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如何确切地将对象表述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她觉得似乎是不需要要什么花招的。那东西是什么就是什

么，先将它实实在在地看住，然后再对它进行理性的阐释。她想用一种平实的、毫不夸饰的语言来表达她所发现和所认识到的一切。她知道，那些重要的观点是生长在材料的厚土之上，华丽的、咋咋呼呼的语言只能产生华丽与咋咋呼呼，各路新方法也只能添一些小小的花絮而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深刻的见解只能来自于厚重的思想与对事物的冷静观察。她将矫情彻底地驱除了出去，而将一派朴素之风留了下来。

台湾只是个小岛，但台湾文学的复杂与丰富却不可低估。对于大陆的学者而言，要真正解读它，大概还需一段很长的时光。可供计璧瑞拓展的研究空间无疑是巨大的。

2001年10月5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 录

序·····	曹文轩(1)
论日据时期新文学的几种台湾想象·····	(1)
忧郁的灵魂	
——以龙瑛宗、吕赫若为例论日据时期	
台湾小说的知识分子性格·····	(17)
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28)
台湾新诗的现代主义潮流·····	(38)
对《现代文学》和《文学季刊》两大作家群的考察·····	(62)
当代台湾散文综论·····	(107)
新世代文学概说·····	(120)
论当代台湾文学论述的演变	
——以叶石涛为分析对象·····	(153)
同一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不同体验·····	(179)
“小说中国”的视界·····	(185)
女性·政治·叙述策略	
——论李昂新近的小说创作·····	(196)

关于一首诗的抒情性、叙事性和戏剧性…………… (209)

嬉笑怒骂皆文章

——简论柏杨…………… (218)

附 录

从人物性格和文学传承论金庸小说…………… (223)

以小说介入历史

——析金庸作品对历史的论述…………… (232)

试论类型

——从《笑傲江湖》看金庸小说的类型特征…………… (241)

后 记…………… (254)

论日据时期新文学的几种台湾想象

一

在各种观念的确定性普遍遭受质疑的时代，写实主义文学观强调的“再现”与“反映”说也在对“客观现实”的多样化认识中逐渐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经由作家头脑和心灵加工而成的文学作品其艺术想象的本质及想象方式（不是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想象方式，而是文本中显现的对特定对象的认知状况和认知态度）的被进一步认知，提供了认识和诠释文学现象丰富性、复杂性的广阔空间；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观念的广为流传，又使文学意义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阐发和文学史的重写成为可能。

通常，历史（文学史）叙述的变化出现在这段历史自形成至经历较长且富有变化的历史时段之后，诠释者可以借助不同时段累积下来的经验和史料，结合当下的理解，作出新的评价乃至再诠释。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叙述被不断丰富，并成为后继者再阅读和再叙述的基本背景。创造、书写历史者固然已将个人想象融入共时性的描述之中，阅读和再叙述者无疑是在前者想象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新的想象，所谓“还原历史”更是

后人想象中的目标或对目标的想象。而无论哪一种想象都会受到史料发掘、想象者动机和立场以及想象方式的共同影响。以大陆当代文学为例，在当代文学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之后，新的总结和诠释已经展开，其焦点问题之一是“十七年文学”。经历了“文革”、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冷静思考等多个不同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新诠释与80年代相比更加冷峻、更突出文学本身的价值。以强调社会认识价值来为“十七年文学”赢得其文学史地位的观点受到越来越普遍的质疑；对文学价值的重视使得文学史家们在披沙拣金之后仍感“十七年文学”艺术追求的乏善可陈。作家队伍的形成、党领导下的出版机制和文艺领导者的内部矛盾和个人性格等被纳入研究视野，使原有的叙述板块发生松动和崩解，形成新的叙述空间。这些新的想象方式在此前的各个时段均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出现或根本不可能出现。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及其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想象方式和对这些方式的再度想象。同样，它们也受到特定时局、叙述者立场和目标的限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日据时期作家张文环1943年在殖民者主持的“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为避免台湾作家遭受迫害，不得当宣称“台湾没有非皇民文学”；而在80年代有关“皇民文学”的讨论中，叶石涛又得出“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的结论。^[1]可见对特定对象的想象的确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

有意思的是，与大陆文学界20年来政治激情的进行性消退恰成鲜明对比的是，自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以来，台湾文学的政治热情始终如一。无论是写实主义大潮中的部分前行代

作家，还是新世代中政治文学的提倡者，都有以文学传达政治诉求和社会批判的浓厚兴趣。尽管政治概念的内涵被大大突破（如性别政治、身体政治、地缘政治等观念的引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治仍然是诸多政治问题的核心，许多作品持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甚至直接表达某种政治理念；理论批评界对文学政治意味的阐发也乐此不疲。产生如此政治热情的原因多种多样，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范围内“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2]有关，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考察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文学确是一种将批评对象和批评主体的想象相融合的方式。对日据时期文学的研究就体现着这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方面由日据时期文学本身的一些基本性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叙述者要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定位为对象确立其历史（文学史）地位，同时为阐明叙述者当下的立场和想象的合理性提供证据。

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抗议文学，是海峡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共同认识，台湾学界更在发掘文学运动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左翼文学”的概念。就大陆方面而言，在近20年前的研究初期，由于明确地服务于统一战线的政治理念，研究突出台湾文学反帝、反封建这一和祖国大陆现代文学主流相同的特性，既有助于强调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为在当时社会形势下进一步展开研究铺平道路。台湾的情况较为复杂，在肯定日据时期文学如是性质的大前提下，不同叙述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想象侧重点均有明显差异。事实上，以反帝、反封建的抵抗文学来涵盖日据时期文学，应属包容度较大、歧义较小的一种想象方式，各方叙述者均可由此

出发来为各自的文学乃至政治主张张目。重要的是，它还能够说明殖民地文学的许多重要特征，如以被统治者、被殖民者的双重身份对统治者、殖民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残酷压迫发出控诉和抗议，兼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两重性；较为明显的“阴性化主题”等。有的研究者在将抵抗文学进一步明确为“左翼文学”时，还将此概念略作剪裁，融入属于日据时期文学的一些特殊因素，如复杂的文化困惑与认同问题等，使之与一般意义上的“左翼文学”，如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普罗文学，既有重合又有差异，使概念的使用减少争议，扩大包容度，从而得出“大部分日据时期的新文学作品都带有左翼色彩”^[3]的结论。

从宏观或意识形态的叙述角度看，上述论述既承继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日据时期文学的基本想象，又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意识形态层次。当然，其理论周密性并非无懈可击，如文学的“左翼色彩”和“左翼文学”之间是否等同；身份认同的矛盾困惑能否纳入“左翼”的理论框架内；“左翼作家”创作的没有明确左翼色彩的作品应如何认识等等。以上述论述为例是要说明：在文学史宏大叙述的光滑表面上，其实存在着许多裂隙，这些裂隙中往往沉潜着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内容。诚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所指出的：文学史研究的重点不是抽取作家作品，用自己的尺度加以评价，而是要努力把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观察它和历史关联的形态特征和演化的情况，关注演化的条件，寻求靠近历史的可能性，比如追问那些被作为事实的事实是如何成为事实的。这样的方式将使原来表面严密的叙述发生崩解，研究者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发现新问

题，从而把过去研究的终点当作新的起点。^[4]

在此观点的启发下，本文试图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想象之中，寻找不能被严格嵌入该想象的作品及其独特的想象台湾的方式，或者在原有的政治想象之外发现别样的文化想象。这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的文学史叙述抱有颠覆的意图，只是显示探寻不同文学想象的愿望，甚至可以说只是对部分作品的个案分析。取样范围限定于日据时期小说。

二

日据时期小说除“皇民文学”外，许多都具有突出的反帝、反封建主题，另有不少作品成为台湾广泛社会经验的记录；同时，一些有明确反帝、反封建主题的作品也兼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风土等内涵，加之部分侧重描述殖民地时代台湾人困惑焦虑的内心世界和殖民地社会复杂矛盾的作品，日据时期文学已经为后人提供了对台湾的多重想象。这些想象之所以引人注意，在于台湾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复杂的文化身份导致的想象内涵和方式的丰富性；在于能为不同时期研究者的再度想象提供多重思维脉络，实现意义的发掘与增值。

毫无疑问，产生于台湾土地和文学最重要和直接的想象是对自身——台湾和台湾人的想象。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主题下，以赖和、杨逵为代表的抗议文学早已确认了台湾人被压迫、被殖民统治的处境和反抗压迫的不屈性格，大量反映台湾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和下层人悲惨命运的作品着力于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不义。这当中具有明显问题意识和抗议精神

的作品，能明确揭示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台湾定位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族，为其抗争呐喊助威。那些单纯披露社会黑暗和人民生存困境的作品，也以凄惨的笔调、黯淡的色彩勾勒出台湾特别是下层社会悲哀屈辱的形象，台湾成了台湾普通百姓的伤心之地。在本时期的创作中，除少数甘愿为殖民统治效力而被嘲弄批判的形象外，难以找到充满乐观向上精神、能够主宰土地和个人命运的形象（吕赫若的《山川草木》可能是少数例外之一）。作家笔下苦难、弱小、饱受欺凌的台湾及其下层社会正是人们所熟知的、较易把握的、与基本历史想象相一致的文学想象。

对自身处境的叙述不能脱离对造成这一处境的原因的思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共同构成殖民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双方，对一方的想象无法脱离对另一方的想象而单独存在。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想象，换句话说，站在被殖民一方的台湾作家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想象，也是自身想象的重要部分，从中往往更能折射出曲折变化的自我认识。恰恰在此，日据时期文学给出了既单纯又多义、既明确又困惑的想象形态。经过日本殖民者长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统治的台湾，民族矛盾的表现形态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最初的武装抗争逐渐过渡到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垒；殖民社会各种基本结构的建立与完善大大促进了殖民者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渗透和结合。从理论上对两者实施截然的区分和剥离极易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殖民统治者的思想、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都可能通过压制和渗透融入被殖民者的思维中，甚至导致后者发生文化和身份认定的混乱；同时，在民族矛盾冲突的缝隙中，两种相互对立

的意识形态或体现意识形态的具体生活形态可能会取得暂时的力量均衡进而平静相处，这才是问题复杂性之所在。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无法回避自身与殖民者的关系问题。具有明确反帝、反封建主题和表现人民苦难的作品大都从各个角度凸显激烈的民族矛盾和与之相关的阶级矛盾，日本警察大人的残暴统治和巧取豪夺是最为常见的文学场景。杨逵的《送报夫》开始运用朴素的阶级分析区分宗主国内部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将后者视为殖民地被统治者的天然盟友，为相对固定的日本想象增添了新色彩。基于天然的民族情感和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小说中伴随殖民者残酷压迫而来的先进生产方式也成为制造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帮凶。吕赫若《牛车》中导致被压迫者家破人亡的先进运输方式在作家眼中并不具有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它与许多作品提到的“产业道路”、“文化村”、“制糖会社”等不啻为殖民掠夺的工具和台湾人灾难的罪魁祸首。

这里存在某种矛盾：殖民者挟强势文化在牺牲弱势族群根本利益甚至剥夺他们生存权利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好处，也为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带来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形态。作家在侧重表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时，这一先进的经济文化形态已被不公不义的殖民统治所掩盖；当矛盾暂时隐去时，日本又似乎以现代文明社会的姿态出现在台湾人面前。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中的日本即以开放、自由、文明的形象成为年轻人寻求个性解放的梦的国度，那艘载着希望和梦想的海轮来了又去，连接着彼岸的浪漫故事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桂花从海轮上收获了自己破碎的梦想，又乘海轮奔赴

“内地”去编织新的梦境。与古老传统的台湾相比，日本分明是“姊妹们”摆脱苦恼的新生之地。如果说这篇小说因未涉及民族冲突而提供了单纯明朗的日本想象的话，那些表现深刻或潜在文化矛盾和殖民地人民心态的作品则复杂得多。朱点人的《脱颖》、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在日本人和台湾人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外在形态下描绘了台湾人不同的心态。《脱颖》中的陈三贵深知凭他台湾人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便挖空心思寻求机会，通过迎娶日本上司的女儿改姓“犬养”，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描述了小知识分子陈有三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由满怀希望到沉沦绝望的历程。无论是曲意逢迎还是颓废绝望，台湾人身份都是他们心中的隐痛，日本和日本人则是殖民统治下傲慢、优越、不公正的化身。陈三贵的身份转换并未历经精神痛苦，因为其委琐的心灵不足以思考文化尊严等问题；对于台湾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日本、接受打着深深的日本文化烙印的现代文明、已无法清除思想文化结构中的日本因素的人物，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认都面临某种困境。这些“走出去的人”传达着作家日本想象中的困惑和矛盾。这当中王昶雄的《奔流》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奔流》发表于1943年，正值所谓“决战时期”，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运动”晚期、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重的时期。完全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一代台湾人已经成长起来，“走出去的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异国文化经验，开始真正面对两种文化冲突，弱势的故土文化和强势的日本文化导致的身份问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究竟做日本人

还是做台湾人，抑或先做台湾人再做日本人？这些问题在他们心中萦绕多时却鲜有明确的答案。

小说的三位主要人物是两位“走出去的人”——“我”和伊东春生，以及即将走出去的林柏年。当“我”“离开住了十年，已经习惯了的东京”，子承父业回故乡做乡村医生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困惑：“数年没见的故乡风物，真正打心底里感到优美，心情是很开朗的。但不能持久。”乡村的单调刻板使“我”“很想干脆抛弃一切，再一次回到东京去”，“并不是自动地努力于内地化，而是在无意识中，内地人的血，移注入自己的血管，在不知不觉间，已静静地在流动那样的心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日本文化、曾经隐瞒自己台湾人身份的“我”，仍然有殖民地人民特有的敏感，“在内地的時候，内地人当然不用说，是本岛人还是中国人，看一眼，就能毫无例外地认出来”。困扰“我”的是生为台湾人的文化压力时常提醒自己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尽管“我”倾心于所谓“日本精神”。小说着力描绘的伊东春生，以其昂扬、优越、讲日语、娶日本太太，处处实践着“日本精神”，不但以做台湾人为耻，也以自己的台湾父母为耻；他心中的台湾人胆怯、闭塞，“殖民地的劣根性经常低迷不散”，回到台湾并不能唤起他对故土亲情的眷恋。但他并不是滑稽剧中的丑角，毋宁说是叙述者严肃思考身份问题的对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否一定要鄙夷台湾？小说用年轻的林柏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位纯真执著的青年不齿于伊东春生的行为，坚定地认为“我若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更非是堂堂的台湾人不可。不必为了出生在南方，就鄙夷自己。沁入这里的生活，并不一定要鄙夷故乡的乡间土臭。”三

位人物对自身文化主体性格的认知各不相同，但其行为思考的背后均隐含着“本岛青年两重生活的深刻苦恼”。

《奔流》是日据时期少有的兼有知性思考和复杂内心冲突的作品之一，限于当时的局势，它对问题的解答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方面抒发热爱乡土的情感，一方面不得不把实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平等的理想放在做“堂堂的日本人”的理念下。日本不单是那个优越、现代、居高临下的民族和国度，似乎还是台湾人维护尊严、提升自己所设定的抽象目标。林柏年终于到日本去了，不是为了背弃故土，而是要做真正“堂堂的台湾人”。

小说的日本想象是以身份问题显现的。按照研究者的说法，“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一个人可以属于不只一个群体”、“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当一个人由追随一个群体而转向另一个时，他的身份看来会发生很多变化。”^[5]虽然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成规而使自己在不同的群体中保持不同的身份，但一种成规试图强制性地取消另一种成规，如“皇民化运动”对台湾人身份的取消，必将导致台湾人身份认定的混乱。要么彻底改换身份，如伊东春生；要么在两种身份的纠结中苦苦思索，如“我”；要么为保持原有身份而决心赢得新的身份，如林柏年。由于日本、台湾两种文化力量的极度不对等，在中国传统的孝道外，林柏年几乎找不到建立主体的文化表征，维持其精神不坠的除了内心对故土的挚爱，竟是日本剑道勇敢不屈的精神。他对台湾的想象终于还是通过对日本的想象才得以